



中国通史 (上)

ZhongGuo
TongShi

周谷城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

Classical
Texts
Series

经典教科书系列

中国通史（上）

ZhongGuo
TongShi

周谷城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周谷城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
(经典教科书系列)

ISBN 978-7-303-14766-3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历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531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2123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g.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30mm×980mm 1/16
印张: 66.75
字数: 11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刘松弢	责任编辑: 冯 欣
美术编辑: 焦 丽	装帧设计: 焦 丽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8284

序

周谷城近百万字的《中国通史》193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1949年共印行12次。1955年至1956年，修订至80万字后改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57年再次修订至7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后又一次修订，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印行《中国通史》25次。近70万字的《世界通史》则于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亦多次印行。本次两部通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在独自撰写了一部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通史》之后，又独自撰写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世界通史》，在现代中国，除了周谷城之外，没有第二位历史学家做到过；在现代世界，也不见其他人这么做过。

两部通史的撰著，是周谷城积极投身中国社会变革，深切了解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他在学术上锲而不舍长期发奋努力的结果。

1898年9月13日，正是戊戌变法开始最后搏击的日子，周谷城出生于湖南益阳长乐乡一个农民家庭。八天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囚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幼年在族立小学就读时，周谷城经历了废科举、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受到了皇冠落地和共和制度建立的洗礼。1913年至1917年，他在长沙省立一中就读，1917年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的岁月，他广泛接触到各种新知识、新思潮，并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在运动中摇旗呐喊。1921年春，他提前半年离开高师，返回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与毛泽东相识。也正是凭借这一机缘，大革命期间，他应毛泽东之邀，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发表专论农村阶级剥削问题的长篇论文《论租谷》。1927年春，他又到武汉在邓演达所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在毛泽东所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任宣传干事，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亲历了正如火如荼发展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这番经

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

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离开武汉来到上海，先后在中国公学、劳动大学等校任教，以译书及为报刊撰稿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他和陈翰笙、许德珩等人联合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奋斗。同时，他还秘密参与邓演达所领导的筹组新党、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动。面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变，周谷城继续认真思考中国农村问题，1929年出版《农村社会新论》。同年出版《中国教育小史》，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了梳理。1930年秋，他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英文社会科学名著选读。结合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他撰成并出版《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书，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中国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反映了在经历了从五四到大革命失败这段社会实践后，他对于中国历史与现状重新思考的成果。

返回上海后，1932年秋，周谷城被聘为暨南大学教授，担任史地系主任，主要讲授中国通史。在这里，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撰写了两卷本《中国通史》，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作为大学通用教材于193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不久，他又撰成《中国政治史》，194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阐述了他对中国政治历史的见解。

在努力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的同时，周谷城又努力重新认识世界的历史和世界的现状。早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期间，他就从日本函购了英文版和德文版两部马克思的《资本论》，阅读后，不仅对马克思的思想学说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尼林的《文化之出路》、美国学者亚诺得的《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及有关苏联外交和教育的一批论著。在广州中山大学，他在所开设的英文名著选读中，指定学生必读的著作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黑格尔《历史哲学》等著作，都和世界历史相关。

在上海暨南大学后期，周谷城已开始开设世界史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无法继续在上海存身，辗转向西南大后方转移。途经杭州时一度被日伪逮捕。脱身后，经陈望道等介绍，到迁移至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史地系等院系任教，同其他进步教授一起积极参与抗日民主运动。1946年

春，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他出任历史系系主任。在重庆期间，他在文学院开设西洋通史课，在史地系开始西洋近古史课，翻译出版了《美国与战后新世界之关系》、《新英国与新世界之计划》等著作。回到上海后，他继续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与发起成立大学教授联谊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保护进步学生。在这期间，他发表许多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都有相当影响。结合教学需要，他购置了一批有关世界历史的英文名著。在此基础上，他集中全力编撰《世界通史》，至1949年完成前三卷，正式出版。

周谷城编撰两部通史，不仅是他进行两门通史课程教学和对中外历史进行研究的需要，更因为他在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在阅读已经出版的中外相关著作中，特别强烈地认识到，中国极为迫切地需要正确认识本国的和世界的现状，而现有的绝大多数著作都难以满足这一要求。西方各国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持有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缺乏真切的了解，他们的概括带有许多偏见。中国不少历史学家继续热衷于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详尽的考证，漠视对历史整体性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常常简单地重复别国政治家与学者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一知半解而作出的若干武断性结论。周谷城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努力改变这一状况。

究竟怎样做才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周谷城认为，首先要善于作长时段的整体性的全面考察。他编著的两部通史具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点，这就是他力求能清楚说明，所有历史事件如何互相有机联系而构成无法分割的统一整体。他在《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中曾坦言：“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到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导言曰《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同时，他强调：“编纂世界通史在认真审核史料的同时，务必力求有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以便得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完形论》对他所坚持的这一方法，作了详细说明。

周谷城指出，史料只是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留下的痕迹，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二者都不是历史自身。

以史料而论，他指出，史料是历史之片段。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完整历史之自身，决非即等于片段的史料。新近发现的北京人头骨，河南、甘肃、辽宁、山西各地先后发现的石器与陶片、殷墟甲骨、新郑铜器、寿县铜器、汉晋简牍、敦煌写经、西夏文字、大库档案、太平天国史料等等，都是很重要的新史料。史学家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从而编著史学书籍，但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若研究只止于史料的本身，考究其来源，分解其成分，加以分类，加以排比，这是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他批评蔡元培“史学本是史料学”（《明清史料序言》）一说，认为“这话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于史学界有益，因为它有利于让治史的人克服轻视史料的倾向，纠正治史中空疏之弊的作用。但有益的话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话。谓“史学本是史料学”，便是承认史料就等于历史，而其实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

以史观而论，周谷城指出，史观云云，只可视为对历史的看法。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视为理性发展史，或像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都只是对历史的看法。本着这等看法从史料当中去寻找历史是可以的，若谓这等看法就是历史之自身却大不可。

周谷城强调：“独立存在，不因吾人之知识而始存在之客观的历史”，乃是“人类过去之活动”。历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这里所说的“诸种因素间不可移易之关系”，就是历史活动的有机联系和发展规律。周谷城认为，人类过去之活动或历史既有其自身，既为客观的独立存在，并不是因我们对它加以认识而始存在的，那么我们研究此活动之时，即研究历史之时，“便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那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当将此客观的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正如矿物学者之研究矿物，不能将矿物化为主观的一样，“所谓历史学，也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而已”。

为确保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周谷城要求克服中国以史为资鉴的固有传统。他说，编著史书而以资鉴为目的，或供后来人之取法为目的，至迟当从孔子作《春秋》始。汉荀悦立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刘知几更广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

罪恶，三曰旌怪异。五志三科合共八项，除通古今、叙沿革、旌怪异三项为著重历史自身之存在以外，其余达道义、彰法式、著功勋、表贤能、明罪恶五项，大抵著重资鉴一边。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更是偏重资鉴，如他自己所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这里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云云，完全是为着资鉴而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直到梁启超，仍坚持着资鉴说，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范围》）周谷城指出，历史完形论并不说治史可以不要目的，也不说治史可以不重功利。反之，其所悬之目的也许比资鉴说所悬者为大，其功利观念也许比资鉴说之功利观念为深。“简单说来，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就在于对“历史自身之部分与历史自身之全体”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取舍很不相同：“目的在摘取先例以资鉴，则任取今人所需要之部分便可以；若目的在阐明历史之自身，则非著重此自身之全体不可。”

周谷城认为，历史之全体与部分之关系，亦如世间其他事物一样：部分与全体同在，为不可分；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绝对的真理，见于相对的诸现象之中。完全的存在，实由不完全的诸部分而成立。历史自身之部分离却历史自身之全体，亦往往不得其解。但历史完形论虽强调历史自身之完整，却并不认为用直觉的方法就可以加以了解。反之，认为历史自身之完整的了解，只能使用分析工作于耐烦的分析过程中求得。分析史事不厌精详。他赞成罗素《逻辑原子论》“部分依因果关系而存于全体之内，唯分析为能得其真”的观点，认为“治历史而亦著重分析工夫，却并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

在这里，周谷城所反复说明和特别坚持的，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它是不以历史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仅仅满足于收集一大批未加分析的零星史料，或只关注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是不可能深入

而全面地了解历史的真实状况的。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重心，正是将中国及世界“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进而“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

以《中国通史》而论，周谷城将整个中国历史分作五篇：一、游徙部族定居时代——中国民族初步形成（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前）；二、私有田制生成时代——社会关系发生剧变（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三、封建势力结晶时代——由内乱到种族战争（自新莽元年至北宋元年）；四、封建势力持续时代——种族战争愈演愈烈（自北宋初至鸦片战争）；五、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工国农国相摩相荡（自鸦片战争至现在）。很明显，周谷城是在借鉴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但是，他又努力依据中国历史实际，在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关注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其后长时间存在的种族冲突。在社会性质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奴隶制社会阶段，上古时代的部族战争，结果是导致封建制兴起，而不是奴隶制兴起，因为当时主要产业是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当时的奴隶，大多数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内奴隶，家奴不可能构成一个时代。关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形成、结晶、持续，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通史》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中国通史》还有三个关注点在当时史著非常突出。其一，关注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反抗运动，对历代农民暴动、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正面的与负面的实际后果，作了较为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其二，关注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如何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同时，还注意到他们如何在一定环境、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而使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其三，关注历史上分分合合、十分曲折、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力图说明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客观地反映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周谷城《中国通史》的这些见解，可谓惊世骇俗。而究其学术价值而言，原版应当更值得人们珍视和重视。江泽民和李岚清在见到周谷城时，都说过，大学时读到周先生的《中国通史》，印象极深，很受教益。他们所读的，便是原版的《中国通史》。

以《世界通史》而论，它完全不是各个国家国别史的叠加，它考察的重点，就是整个世界如何通过不同地域复杂而曲折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

约，一步步形成密切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书分成三篇。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研究人类起源，研究尼罗河、西亚、爱琴海、中国、印度河、中美六大远古文化区的形成与演变，讨论文化传播与文化创造的不同功能，强调“没有创造，文化的发展便无法开始，没有传播，创造出来的东西便无法展开”，并说明，文化传播确实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一者放射，一者模仿，更应重视的是传播者的挑战，如何刺激应战者自创一种崭新的文化。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叙述波斯势力之兴起，由亚历山大东征、大夏与安息之独立和波斯中兴、阿拉伯势力西进、十字军东侵、蒙古的兴起和西征这五大事件造成的亚欧政治社会版图的巨大变化及不同文化的广泛交流，研究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如何各自演进，以及东西方之间如何通过商业贸易活动、交通道路开辟、科学技术与艺术宗教交流而逐步联系在一起。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依次论述欧洲社会政治的演变、欧洲由大陆活动向海外开拓、西方重商主义的成功、东方重商主义的失败、重商主义下世界的变化、东西方思想的发展。这部世界通史，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重视欧洲以外各大文明区域、各大民族在世界发展中的功能与贡献，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之中。周谷城原计划还要撰写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叙述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的新格局，并已列出各章题目，依次为：产业革命之展开、民主政治之发达、帝国主义之演进、社会主义国之成功、资本主义国之挣扎、平等世界之创造。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世界格局开始全面重组，许多重大变化需要继续观察，这一卷迟迟未能动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仍想找几个助手协助写出第四篇，他们已写出大部分初稿，但他觉得和其初衷距离较远，搁下未去统稿和修改。这是他的终生憾事。尽管《世界通史》仅完成三册，仍不失为中外史坛一朵奇葩，因为它打破了在世界史研究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论，以真正的世界，对于世界联系形成的历史作了提纲挈领的整体考察。

综观两部通史，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受到，书中思路特别清晰，内容取舍和纵横结构独具匠心，谋篇布局很有讲究，逻辑性非常强。这显然是以坚实的史学素养为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周谷城深厚的哲学、社会学、美学、逻辑学修养。他晚年曾回顾说：“五四时代我博览群书，社会学、心理学我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家，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不少。”“我很喜欢读社会学，各种各样的社会学都读。”

(《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至于逻辑学，他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小逻辑》，曾翻译《黑格尔逻辑学大纲》，熟悉事物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辩证法。形式逻辑，则更是他的擅长。

从出版的《生活系统》一书，可以大致了解作者后来编撰两部通史及他整个学术思想最初的哲学基础。这部著作提出，在讨论人生观之前，必须“先把生活本身弄个明白”。书中讨论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批评温德心理学将知、情、意看成并立的三种精神活动，而认为情、智、意是人脑活动三个连续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的科学生活、艺术生活、信仰生活，它们分别与智、情、意相对应。周谷城提出：“科学的生活，是以我御物的生活，我与物相竞争的生活。”而艺术的生活即自然的生活，是“物我浑融的生活，不知其然而然的生活，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所谓“信仰的生活”即在福、祸多变的社会，必须立住一种信仰，“依着信仰，向前走”。这三种生活前后相续，并构成前后连贯的循环：“由我们研究的结果看起来，生活之全体，是变动不息的。其状态是时时变换的。物我浑然一体之境，有时不能不折入痛苦难堪之境。痛苦难堪之境，绝对不能不折入纯粹思想之境。纯粹思想之境，绝对不能不折入信仰之境。信仰之境，绝对不能不复入物我浑然一体之境。生活是这样轮转一次，便是进化一周。轮转不已，便是进化无穷。”知是“物我分显之境”(科学)，意是“心理行动均有定向”之境(信仰)，情是“物我浑融一体之境”(艺术)。这正好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周谷城要求历史研究必须“寻出诸种因素间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实际上，就是努力揭示客观历史自身辩证的发展过程。

正因为一贯如此重视生活本身，一贯如此重视生活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周谷城的两部通史便很自然地能够高屋建瓴，统揽全局，以此为主干，条分缕析，清楚展现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人们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这也正是这两部著作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而继续为许多人所爱读的原因之所在。

我于1957年9月做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第一学期周谷城就为我们开设世界上古史。复旦大学1946年迁回上海，他和其他师生一道返沪，并担任了历史系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他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期间，正逢院系调整，为吸

引许多著名教授来复旦，他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进校时，他只担任世界古代中世纪教研室主任。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节课上，他开宗明义就说，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对于博大精深四个字的内涵，他逐一作了讲解。每次一进教室，他就拿着纸质已经发黄的旧讲稿，照着在黑板上写上整整一版，然后，逐字逐句作一些解释，接着，就开始开“无轨电车”，介绍各种学术掌故、名人轶事。这常常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内容。而下课铃一响，他一秒钟也不耽搁，就宣布下课。1958年“教育革命”中，人们批评他讲稿陈旧。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世界古代历史本来就是那样，没有重大的新的发现、新的突破，我的讲稿自然不需要改动。

我第一次到茂名公寓周府去拜访，是学期中拿了我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篇习作向他请教，因为我认为苏联学者以家内奴隶为特征的所谓东方奴隶制说难以成立，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周先生竟不以为忤，亲切接待，不久，还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予鼓励。

其后，周先生再没有给我们开过课，但以他为中心而展开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史学与美学、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等等争论，我们却都熟知；他的那些逻辑性极强的雄辩文章，读了也令人们精神为之一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开始不久，他就成了上海集中火力批判的第一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大幕一拉开，他又升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和周先生较为密切的接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同住一间“牛棚”，一道接受每日训话，一道接受各种批斗，一道在学校中进行“劳动改造”。所谓“牛棚”，是历史系一间最大的办公室，撤除全部办公桌椅，全系“牛鬼蛇神”集中起来一个个紧挨着打地铺住在里面。当时，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等历史系最有名的教授和我们这些年轻的“牛鬼蛇神”天天生活在一起。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批斗中，周先生对于他所提出和坚持的重要学术观点，一如既往，照样坚持。面对那些批判者气势汹汹的谩骂，他或轻蔑地不予置理，或奋力据理抗辩，经常令对方理屈词穷，难以招架，以致在后来的批斗会上，批判者知趣地不去触动这些问题。

我那时正年轻力壮，在劳动中总尽可能地自己多吃一些，设法照顾一下这几位老师，不让他们过分劳累。几位老师中，周谷城先生最为豁达，在没有集中居住时，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已从市区淮海路家中赶到系里，

坐在系门口台阶上安安静静地等候开门。相比之下，周予同、谭其骧先生精神负担最重。所以，只要有机会，我总要劝劝他们两位。我给周予同先生说过：当年，您和匡互生领头翻过围墙，火烧赵家楼，将五四爱国运动推到高潮，历史是不会忘记你们，会给你们以公正评价的。给谭其骧先生，我则和他一起分析：既然一再说要团结干部与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而现在批判打倒的人数至少已超过百分之十五，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必定要“解放”出来。毛主席交办的重新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除去您谭先生，谁能主持？所以，您的“解放”，是迟早的事。心一定要放宽。周谷城先生面对巨大的压力，一直比较镇定，几次涉及他和毛主席交往的情况时，我总说：我相信，毛主席是不会忘记您这位老朋友的，总有一天，会想到您的。

正因为如此，几位老先生对我特别亲切友好。陈守实先生于1974年去世；周予同先生身体不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就离我们而去。周谷城和谭其骧先生，晚年都在学术上作出了卓越的建树。两位老师，一直继续关心着我辈的成长。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包括他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后，对我辈依然爱护有加。凡是我們出面有求于他，无论是主持编撰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民国丛书》，还是请他出席或主持各种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无不一口答应。

周谷城先生先后四次题字相赠。1984年题师母李冰伯亲绘山水画相赠，所题为周先生旧作两句：“横扫千里无斧钺，俯冲万壑有波澜。”1985年题词：“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世纪90年代一题：“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一题：“不矜不伐，有猷有为。”四帧题词，是对后辈的勉励和告诫，同时，也是周谷城先生自己立身行事、治学立言的生动写照。这四段题词，可以帮助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周谷城先生的两部通史。

姜义华

弁 言

一，本书为作者史学五书之第一种。史学五书包括：一，中国通史；二，中国经济史；三，中国政治史；四，中国思想史；五，中国文化史。今日中国所亟须完成者，果为何种经济制度？何种政治制度？何种思想？何种文化？倘明白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当能略有所见。作者为此，近数年来，颇留心历史，总想把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稍予阐明。兹先出版《中国通史》，其余各种，当陆续刊行。

二，本书取材，除摘录正史外，尽量利用中外学者专家所整理所发见之各种新史料。所有史料均摘录原文，注明出处，以存真相。唯摘录原文，始终只作证明之用。至于史事之连贯，编者仍有说明；与寻常仅录史料而无说明者不同。

三，书中引用的史料，有的是白话文，有的是接近文言文，有的是古文。读者对于所引古文如感到困难之处，无妨暂时略去。不过引用之古文，均加了标点符号，且原文前后都有说明，亦颇容易了解。有功夫阅读，自以不略去为是。

四，本书原系一种讲义：计第一第二篇会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讲授一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各篇会在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讲授三遍。讲授之时，每章末了均附有习题。兹为节省篇幅计，一律删去。

目 录

CONTENTS

上

导论 历史完形论	1
一 历史完形之基本理论	1
史料史观非历史——过去活动为历史——历史自身之存在——历史自身之完整	
二 破坏完形之各体史书	9
历史纪录之发展——两种体裁之批评——纪事本末之优劣	
三 维护完形之通史释义	18
专史之和非通史——通史对象为活动——维护完形之通史	
第一篇 游徙部族定居时代(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前即公元前七七〇年以前) 中国民族初步形成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序幕	29
一 未经记载的历史	29
从北京人到仰韶——仰韶时期之推断	
二 中国历史的序幕	34
夏为中国史序幕——由序幕转入正幕——先民努力的三端	
第二章 先民怎样对付天然	40
一 空间的占领	40
水患的浩大——山居的推断——治水的意义——治水的记载	
二 时间的记取	45
传说的历法——所谓朞与闰——记时的方法——商代的历法	
三 器具的发明	50
夏之石器——商之铜器——周之铁器	

四	生活的演进·····	53
	商代以前的生活——商之畜牧兼农业——周代农业之盛况	
第三章	诸种部族怎样相处 ·····	58
一	诸种部族之所从出·····	58
	亚洲的黄种——中国的民族——民族的问题	
二	诸种部族互相战争·····	60
	战争的原因——战争的频繁	
三	几种较大的战争举例·····	64
	汉族与苗族的战争——汉族内部的战争——汉族与藏族的战争	
四	长期战争所生结果·····	69
第四章	社会次序怎样树立 ·····	71
一	封国之出现·····	71
	封之意义与必然性——所谓封国及其种类——封国与中央的关系——关于封建制的讨论	
二	土地之划分·····	75
	关于井田的记载——周代田制的推断——论所谓井田制度	
三	权力之传授·····	80
	权力传授亦有问题——周以前之传授问题——周代所行之继统法——由继统法到宗法制	
四	等级之次序·····	86
	君臣之分的确定——自天子至于庶人——生之者与食之者	
第五章	宗教在上述诸问题中之地位 ·····	91
一	以下决疑的方法·····	91
	决疑用卜——所卜之事——卜之方法——所信之神	
二	崇拜祖先与自然·····	96
	崇拜祖先——崇拜自然	
三	宗教的社会作用·····	100
	宗教统一团体劳动——宗教统一作战行动——宗教稳定社会次序	
四	主持宗教之人物·····	105
	周以前之儒者	

第六章 新次序下之经济盛况	107
一 由政治到经济	107
等级次序与生产——周人努力与生产	
二 生产发达概观	110
农业之盛——工商之兴	
三 经济酝酿新变	115
 第二篇 私有田制生成时代(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即自公元前 七七〇年至公元九年) 社会关系发生剧变	
第一章 新经济腐蚀贵族	119
一 周天子之逐渐腐化	119
穆王满之远游远征——厉王胡之贪得嗜利——宣王靖之最后 挣扎	
二 共主资格逐渐没落	125
自幽王至春秋之世——诸侯压倒天子——天子败于诸侯	
三 各国贵族以下犯上	129
诸侯腐化——鲁之三桓——齐之田氏——晋之六卿	
第二章 新经济促成霸政	135
一 概说	135
泛论霸政	
二 典型的齐霸	136
齐先称霸的原因——齐国称霸的事实——齐霸中之一要 人——管仲之法治主义	
三 其他的霸者	141
自宋襄至晋文——秦与晋的关系——晋楚争霸与弭兵——吴 与越迭称霸——结语	
第三章 新经济产生新阶级	149
一 地主之出现	149
地主之来历——士变为地主	
二 商人之抬头	153
商业之发达——商人之抬头	